



报告文学春秋

范培松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现代写作丛书

报告文学春秋

●范培松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报告文学春秋 Bao Gao Wen Xue Chun Qiu 范培松编著

责任编辑：王桂兰 封面设计：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 插页 254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5 203 定价：4.2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126—2/I·27

序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不算是生疏的东西了。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考查，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传说的文学观念，把它列入游记，写人记事之类的散文范围内，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有些编辑同志，还把它当作散文划分文类，便是一个明证。但从这一事项也说明了两点，其一，是传统的文学观念根深蒂固，先入为主；同时，却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用自己特具的艺术魅力证明自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文学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是有一定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是三十年代初间，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时期，我们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所发现的一种新式文艺武器介绍进来并学习运用的。因此，横贯三十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时空，在当时动乱和战争的环境里，我们除过翻译介绍了国外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文章和作品外，自己也开手创作了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其中也很有一些名篇，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它作为一种埋葬旧世界，催生新时代的政治斗争性很强烈，而又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文艺尖兵，活跃在战斗生活的前沿阵地，充分发挥了它的政治战斗功能，因而受到热烈的注目和欢迎。但它到底是一种文学样式，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标准来要求，总的说来，它还没有达到前辈的报告文学家基希所说的“艺术的文告”的要求，它应不同于新闻纪事，更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品，它应该在如实而及时地反映和报道发

生在生活中的人物，事变时，应具有自己的文学气质及风格、艺术上的审美价值。从当时的创作作品看，它们多半是即兴之作，写于动乱的社会和战争环境里，作者还来不及对自己所掌握的素材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思考，在艺术处理上更没有精雕细琢的余裕；因此，从创作的主体作家来说，也还不可能造成独立门户的专业作家。至于理论研究，当然尚处于草创阶段。建国以后，它在创作上虽然呈现出新的旺盛，优秀的作家作品也大幅度的涌现，在理论研究上也很有些起色，却又由于我们文艺指导思想的偏误，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严重干扰，在封闭性的社会条件下，它的写作题材范围却越来越变的狭小，它的批判性能也逐渐消失于无形，有些以歌颂为主的作品，又越来越多地掺杂了“假大空”的水分，作为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的真实生命力之所依的写真实的要求，更被视为所谓修正主义谬论，一再受到毁灭性的批判和讨伐。到了“十年浩劫”时期，文学沦为神学的奴婢，它只是“四人帮”掌上的政治玩具，当时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堕落为替“四人帮”篡党夺权政治阴谋效劳的驯服工具，它的真实的文学生命，事实上已彻底宣告死亡了。

因此，从历史发展看来，我国报告文学的真正崛起，作为一门独立的文体，真正得到确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学性格和社会地位，应该说是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才重新开始的。这是由于生活本身的巨大变革，价值观念的更新，尤其是对“四人帮”的清算，对左的思潮的排除，由此，通过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本身的检验，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认识，也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那种报告文学的认识，也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那种就事论事地对事物的表层现象的描述和报道的旧程式，那种强调它的宣传意识、政治要求而忽视客观事物的真实价值、报告文学应具有的文学性能的理论准则。随着报告文学观念的更新，它

的题材领域也得到无尽的开拓和发展，在创作实践中打破了过去极左路线所设置的一个个禁区，它的主题开掘也日益得到深化。至于在艺术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上，艺术门类的长处和优点，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开拓自己新的艺术境界。因此，它成为新时代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学品种；因为它和生活最贴近，往往成为一种社会舆论力量，它的新闻讯息价值也更为突出。它的许多名篇，传诵全国，名扬海外，也确实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从各生活深层来的作者，造就了一批各有特色的专业作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在学术界，有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会；在出版界，出现了专业刊物和众多的丛书与专集；在国家设置的文学奖内，它也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枝得到认可，获得奖励。对它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也正式形成一个专门课题，并且进入高等院校课堂和研究室。眼下范培松同志的这部《报告文学春秋》，便是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写就的一部值得欢迎的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专著。作者在本书内，不仅对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进行了新的历史回顾与总结，作者更着眼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随着报告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所反映的从理论到方法上的许多深刻的变化和发展，对它所积累的那些丰富而新鲜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它的发展势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与探索。这里我只是拉杂地抒写一些自己的观感和认识，就教于同好。

作者把全书分为四大块，这种块状式结构，形式上各成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每一个大块里，作者集中一个专题，从尊重客观实际出发，广征博引，抒发了自己独到的新见。因此，全书从结构形式到内容论点，又可说是作者自己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

第一大块，作者题名《报告文学春秋》，顾名思义，它主要

论述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发展变迁史。作者把视野伸向广阔的世界范围内，着眼于从这一文体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进行观察和思考。因此通过考证，作者提出报告文学是从“文学与游记的缘”产生的新论点，同时，也藉以说明了这一独立文体与传统文学体裁的历史渊源关系，它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正是在历史激变的形势下，从传统文类脱颖而出，自成门户的一种新兴文体。从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实践经验出发，作者对报告文学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又提出了它的真实性应该是一个“近似值”的新论点，这正是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根本区别之所在。语云：“论从史出”，我认为，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新论点，正是他严肃地凝视史实，视力和思考力深化的结果。同时，也从总体上说明了，报告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边缘学科，它应该是在不断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发现自己，开拓自己的过程。任何一门学科或文体，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凝固模式而存在，它就没有生命力了。整部文学史，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第二大块里，作者对报告文学的主体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而这一论题，却是近几年出版的有关报告文学论著中未曾接触到的一个空白点。作者在这里充分论证了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家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正是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因为，在文学创作中，不管题材如何真实动人，如果没有和作家的思想和情绪相结合，没有通过作者自己的深入感受、理解、消融的过程，作品就不会有真实的生命光泽。而这一点，却是多年来在左的机械反映论盛行时期，被忽视甚至遭到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的问题，因而也成为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论著中未曾接触的问题。但是，客观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深入研究创作问题，必然要碰到这块礁石。范培松同志在他的这部新著中，首次接触到这个议题，并且正视它并对之理性的分析和论

证。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也是对报告文学在理论建设上的一个突破和提高，从而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也将会发生积极的启迪意义。

本书的第三块，在“报告文学艺术论”里，作者对于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通过自己的归纳，分析和研究，分别进行了有的放矢的论述。

本书的第四块是“点将台”，是作者对我国十九位报告文学家所进行的客观、公允、全面的论述和评价，是十九篇报告文学家论。作者在进行评价时，一不虚美拔高；二不隐恶扬善或隐善物恶；三不胡乱吹捧；四更不打棍子。显示了作者在人格上的真实和学风上的严谨朴实。

总的说来，此书自成体例，自成一说，即不人云亦云，而又绝无新旧方巾八股腐气；即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又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新意义。它浸透着作者的历史深情、时代灵感，也渗透着作者在治学上的开阔眼光、求实精神和在理论上勇于探索的胆识。

我喜欢这样入情达理的理论著作，因为它除了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也给人以精神上的美感享受。也因此，我很乐意把它推荐给新时代的读者。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研究和教学，将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帮助和影响。

贾植芳

1987年5月初 在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贾植芳

报告文学春秋论

危险之路	(1)
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1)
论新时期的报告文学	(36)
一桩难以理清的笔墨官司	(47)
又一种非驴非马的文学样式——报告小说	(60)

报告文学主体论

报告文学主体论	(70)
论报告意志	(85)
淡化“宣传意识”	(98)
在反省中强化“使命意识”	(110)

报告文学艺术论

报告文学的艺术构思	(122)
报告“三术”——纵横术、论辩术和鼓动术	(140)
从“天堂”回到“人间”	(157)
重在描写“一鼻，一嘴，一毛”	(173)
报告文学抒情的艺术	(187)

报告文学的“春秋笔法” (199)

点 将 台

刘白羽	(211)
华 山	(216)
黄 钢	(222)
穆 青	(227)
徐 迟	(232)
刘宾雁	(241)
魏 巍	(251)
黄宗英	(256)
理 由	(263)
李延国	(270)
柯 岩	(276)
陈祖芬	(281)
乔 迈	(287)
苏晓康	(293)
钱 钢	(297)
刘亚洲	(302)
祖 慰	(307)
鲁 光	(313)
李玲修	(318)
肖复兴	(322)
跋 语	(327)

报告文学春秋论

危 险 之 路

——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

基 希

半个世纪以前，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报告文学大师，著名的捷克作家基希以“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为题，作了精彩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一语双关地指出：报告文学“不仅对于世界的剥削者说来，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对这一论断，前半句，即报告文学对于世界的剥削者来说，是个危险的样式，尚可理解，因为报告文学是艺术地揭发世界剥削者罪恶的文告。其后半句，便引起了许多报告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困惑和不解，一种文学样式怎么会是“危险的文学样式”，给作者“招致危险”呢？所以，有些好心的同志对此曾想从理论上进行论证诠释，把它讲得高深莫测，似乎基希这句话中还包孕着深奥的什么哲理在里面。其实，在笔者看来基希的原意很清楚，很通俗，他就是说，搞报告文学创作要担风险，有危险性。在当时，基希这一些话，也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理解，可是当报告文学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现在再来看看基希这句话，你不由得会惊呼：危险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真危险！

倘若要举出报告文学作家因写报告文学招致危险的实例，可以轻而易举抓到一大把。不必到以往历史中去寻找，就举近几年来的事例，请看：

安徽的报告文学作者徐子芳同志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是一个明白人》，仅是为一个普通的人物说了几句话。这下却捅了马蜂窝，掀起了轩然大波。作者在《为开拓者立传》一文中这样描写他所招致的危险：“有人到处散发告状信和上访，有人画漫画寄到编辑部，甚至有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也不顾降低身份，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与无名的作者‘论战’。而他所谓要‘调查’的三个问题，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使人哭笑不得。奇文供欣赏。不妨将这三个问题抄录如下：一、这篇稿子（指《他是一个明白人》）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笼的（听口气，还是“文革”中的调调。诸如“背景”、“出笼”之词的运用，岂是失实的问题呢，分明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大毒草呀）？二、你是怎样认识张大为的？你与他有什么关系（看看，这把作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看成什么样子了，似乎我们在这里策动一场政变似的那样令人可怕）？三、你的材料是哪些人提供的（这不是要列黑名单吗）？简直是磨刀霍霍，不寒而栗。刘宾雁因写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而获罪。被打成右派。

震动中外的“江南命案”，正是因为江南在一篇报告记实的文章中，向世界披露了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最高领导的真实情况，最后饮恨枪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作者所受到的危险是因为写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倘若他们写表扬某个人物的报告文学，可能不会有危险了吧？照样有！苏州市的杜芸芸，是全国的著名人物，她向国家捐了十万元遗产，总应该表扬吧。可是当表扬她的报告文学在

《文汇月刊》上刊登后，有人就以失实为名，对作者兴师问罪，直至惊动省委，派出调查组调查。而杜芸芸的遭遇更糟，不仅收到许多莫名其妙的来信，如对她嘲笑、谩骂，还有的人以各种名义向她借钱，无辜遭到人们的冷眼和攻击，弄得痛苦不堪。在苏州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市报某记者写了一篇表扬某厂的一位工程师的报告文学，其中因为对该厂的领导也说了几句话，这一下子不得了啦。这篇报告文学在江苏省的大型刊物上发表后，结果有人就兴师问罪，最后不得不请江苏省另一刊物的主编出面，再组织一位同志去写一篇专门歌颂该厂的大好形势和该厂某些干部的功绩的报告文学，才算平息。

报告文学不仅给作者招致危险，甚至还会株连祸及到被报告的对象。报告文学作者李宏林的报告文学《龙艳》，是报告丹东市龙艳十三年照顾瘫痪青年李忠琴的事迹。照理，这篇报告文学是单纯歌颂龙艳，也没波及什么人，总不该有危险了吧！可是恰恰相反，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丹东市评选1981年市先进生产者的时候，突然刮起一股贬低龙艳的风，说她工作不好，不热爱本职工作。诚然，这仅是小小的危险，还不算什么。江苏省的报告文学作家杨旭同志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检查官汤铁头》，那是赞颂靖江县的政法党组书记汤建洲的。可是报告文学发表后，惹麻烦了，汤建洲被调职，撵出政法队伍，连支持汤建洲的县委副书记也只能在家长期养病，靠边站。有时甚至于因为报告文学表扬了一个人，原来此人准备提拔的却不能提拔；原来应该受到重用的，结果被调离；等等。写到此，我不由得想到徐迟采访陈景润的情景。徐迟初到科学院，准备去写陈景润。陈景润一听到要写他，惊恐万分，东躲西藏，陈景润也许不知道基希说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的名言，不过，他倒是深知报告文学的危险，给报告文学粘上了，也许是凶多吉少啊。

报告文学给作者招致的危险，有时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文坛上有两位著名的作家，他们可称是莫逆之交，结果其中一位作家为另一位作家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出版后，被写的那位作家大为不悦，两人从此产生了隔阂，友谊受到了损害。粉碎“四人帮”后，有位报告文学作家为一位著名女歌唱家写了篇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中间有那么一两句话，涉及到这位歌唱家的生活上的事，据说，这位歌唱家就受不了啦，气势汹汹地写信责问骂山门了。这些大概也是报告文学作者所没有想到的。

据我所知，因写一篇报告文学，官司打到党中央最高领导处，有好几次。因报告文学，引起中央派专门调查组，或者省委、市委派调查组，大概也都是有过的吧。甚至于对报告文学作家监视，不给住，不给吃，造谣中伤，也都发生过。难怪有人惊呼：危哉险乎，我们的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作家李延国则说得更形象，更通俗，他说：报告文学事业是“辛苦的事业，厚脸皮的事业，担风险的事业。”（《礼赞这英雄的国土》）

这些仅是我们国内的一点实例。文学样式是没有国界的，它在国外的待遇决不会比我们国内好。就以提出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这一著名论断的基希为例，如果他再给希特勒抓住，即使有十个脑袋，恐怕也得被砍掉的！

我列举了这么一些实例来证明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还想说明两点：一、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但决不是每篇报告文学都是危险的。有些不仅没有招致危险，还捞到好处和油水呢。现在不是有一种新发明：某刊物不景气，财源枯竭，便想出一个绝招：我在刊物上为你发一篇报告文学，你为我提供一笔可观的赞助。这样的报告文学有什么危险？这叫油水文学，马屁文学。并不奇怪，世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既有危险的报告

文学，也必定有油水的报告文学。我在此郑重声明：本书论述的是称之为“危险的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决不是论述那种油水的报告文学。如果有人想搞报告文学创作，去捞油水，请不必阅读此书！二、我列举了这么一些事实来证明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决不是想夸大报告文学的作用，更不想把报告文学的威力估计得过高。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原子弹。我想，也确实是那么回事。但不管怎么说，在文学样式中能招致如此危险的，应该说只有报告文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报告文学创作那是一条危险之路！但是我们又可无愧地说：这正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的光荣和自豪。

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准备踏上这条危险之路的同志，都得应该认真思索一下——

思索之一：报告文学的危险性是怎样产生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其他文学样式没有这个问题，独独报告文学怎么会招致如此多的危险呢？

这就要从报告文学的本体特点来考察了。因为报告文学是从通讯报道蜕变而来，它要求新闻真实，事实真实，就必须写真人真事。大背景要真实，具体环境、细节、人物语言和人物肖像都要跟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力求一致。夏衍同志在谈《包身工》创作时就说：“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这就是说，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事件乃至某一细节、某一数据都必须符合事实，要做到言之有据，有案可查，真实可靠，经得住“打官司”，经得住核对和检验。一句话，它以真服人，以真感人，以真取胜。假如哪个人看了一篇小说，一场电影或一本戏剧，去“对号入座”，指责作者是写的他，骂的

他，人们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说他是个“大傻瓜”，“有神经病”。而报告文学则不同，一篇报告文学问世了，不管是歌颂，还是揭露，人们只要看到你标着“报告文学”，就把它作为真实材料来对待。人们理所当然要“对号入座”，一“对号入座”，事情就麻烦了，危险也就接踵而来了。因此，报告文学获得“危险的文学样式”的称号，就是因为它是具有新闻真实和事实真实的文学样式。

这样，人们不禁又要产生疑问：新闻通讯同样也具有新闻真实和事实真实，为什么它们就不是“危险的文学样式呢？”

笔者认为：基希说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这是和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确实，一篇新闻通讯，也往往会招来大祸。新华社记者王彪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报道，和河南省委的官司一直打到中南海的勤政殿上。但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的“作家要象不使作品失去艺术性那样地审慎地选取绘画器具，在正确的展视中，组织自己的记述，而必须把它作为是艺术文告——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所以确切地说是它的艺术式的新闻真实，才使它变成“危险的文学样式”。再说，新闻通讯也不属于文学范畴，并不是文学样式，它们也完全可以不必来争这个“危险的文学样式”的称号了。

艺术式的新闻真实，使报告文学获得了“危险的文学样式”的称号。但是，艺术式的新闻真实的本身是无罪的，没有过错的。问题是因为这种艺术式的新闻真实要积极地干预生活，要“贬锢弊”、“论时事”，要对邪恶的势力进行审判，挞伐，这样它必然要招来仇恨。但真正从每一篇具体的报告文学来说，要想得到“危险的文学样式”还不那么容易。它要求作者能真正变

成生活的真实报告者，那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的。正如有的报告文学作家所说：报告文学越是接近真实，越是要触动另一些人；百分之百的真实，就意味着百分之百地揭露另一些人。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报告文学作家越是真实地报告生活，就会越招致风险，这一可怕的正比例，倒是可以用上一句俗语了：报告文学作者创作报告文学完全是顶着石臼作戏，吃力不讨好。

思索之二：怎样正确对待和消除报告文学给作者招致的危险性？

首先，要对各级领导呼吁几句。当一篇报告文学引起了争议的时候，不必大惊小怪，以少干涉为宜。有时不干涉更好，一干涉反而把事情弄糟。如果一个报告文学作者能根据自己亲身的调查，把他的心里话掏给大家，即使是不一定正确的意见，都应该鼓励。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堵塞言路，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最后孤立的是自己。尤其是，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引起争议，便以组织出面，兴师动众，派调查组，这不是上策。因为派调查组大多数是由于被揭露的对象告了状，尔后惊动了某领导，这样，便派调查组。这种做法的本身，在报告文学作者心上就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对那些向报告文学作者泼污水的人倒是一个支持。而且调查来调查去，有时往往不了了之，这种模糊又常常是对正义的惩罚。报告文学既然也是文学作品，在对待作品上有争议，完全可以如文化部长王蒙所说，“对一个具体作品尽可能不要以组织和政府的名义来表态”，“一个作品有时争论不休，甚至可以争论几百年。所以由党和政府表示明确的态度，没有必要。”（《新民晚报》1986年7月24日报道）最好不要采用派调查组的作法，如果万不得已，非派调查组不可，那么就得下决心调查清楚，搞个水落石出，并把调查结论